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总主编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佛禅文化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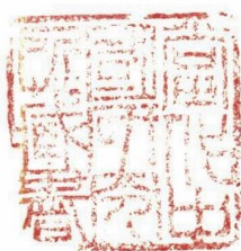
主编 李 淼

010841

中国
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张岱年 石 翔
总主编

中国佛禅文化名著

李 森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数字资源
PDG

责任编辑:金东勋

封面设计:尹怀远

版式设计:全明波

中国佛禅文化名著

李 森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字数:501千字

印数:1—2,000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0783-9/I·58

定价:32.90元

数字图书馆
PDG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学术思想空前发展的兴盛局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后二千年来，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虽然也曾经过曲折，然而总体趋势却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断涌现和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的屡屡诞生，便是使中华文化卓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背景下，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思想的渗透和浸润更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思想铸造了国人的灵魂，培育

了民族性格。

《论语》原是儒家先师孔子的一部言行录，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汉代以后，从蒙童的诵读开始，成了读书人的“圣经”；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注释之后，便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论语》的生命力仍然不衰；就是到了现代，《论语》的发行量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版再版仍然是惊人的。其中的名句，仍然在印刷品里大量被引用。

何止《论语》如此，在中华文化灿烂的园地里，其它思想体系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筛选，也各领风骚，连峰叠起。道家学说，至今仍使超然者愉悦；孙子兵法，千秋传诵；佛禅之道，信奉者不乏其众，秦汉之前就已吹响的要求变革的号角，一直或高亢或暗哑地回响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时代，变革思想对民族的觉醒与前进产生了巨大作用……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都在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感召着每一代人奋然前进。

思想文化与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关系即然如此密切，自然引发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到底哪些书、哪些思想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最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最能渗入人们灵魂，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性格呢？1923年胡适之撰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亦撰写了《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等等。这些书目，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

参考。《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也是为对此有兴趣的学人比较集中地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意见。

延边大学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从塑造民族灵魂与性格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名著中，将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著作或全录或选其要按儒、道、佛、兵、法和神秘文化、性文化、帝王文化、处世文化、革新文化十大类别，集中编纂，加以作者简介、注释与简析，呈现给广大读者。这样分类，当然只是相对的，各卷之间有些交叉是难免的，命题也不一定都那么准确。例如“神秘文化”，近年来此类图书的出版虽然屡见不鲜，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界定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中一些著作，宣扬迷信等消极层面如何加以分析与剔除，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讨论。然而考虑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此类著作在坊间的较大生命力与民间现实生活中的一定影响，在舍与存的选择上，还是以保留为较完整。再如“帝王文化”，本是政治文化之一种，其内容虽然大都是关于封建专制统治者治国御人之道的，然而它们的认识价值与经过分析之后的借鉴作用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此等等。每卷书之前均有该卷主编撰写的导言，对上述之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请读者留意之。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将是人类更加文明的新起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所当然要为此做出新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并分析中华民族灵魂与性格形成的渊源与脉络，对其精华部分发扬光

大，对于束缚我们民族前进的糟粕部分加以批判并摒弃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武装自己，放下包袱，重铸民族魂，再塑民族性格，大踏步地前进，从而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绵亘的山系，其宏富、深邃与复杂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随着历史的推衍，自身也经历着一个发生、发展、碰撞、转变的过程。它对国人灵魂的影响与铸造更是复杂而多变的。它与历代统治者强化灌输、学者文人著作的感召与感染、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的编选主旨与方法，包括它所划分的类别、每一类别所选列的名著、对名著的注释与解析等等，当然只能是一种尝试，因为这是一项既有意义又相当困难的工作，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导与批评。

1995年11月

目 录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 张岱年 石翔	1
导 论	····· 李 森	1
《四十二章经》	····· 迦叶摩腾 竺法兰译	8
《阿弥陀经》	····· 鸠摩罗什译	16
《观无量寿佛经》	····· 曇良耶舍译	24
《维摩诘所说经》	····· 鸠摩罗什译	39
《妙法莲华经》(节选)	····· 鸠摩罗什译	89
《百喻经》	····· 伽斯那集 求那毗地译	199
《金刚经》	····· 鸠摩罗什译	262
《楞伽经》	····· 求那跋陀罗译	276
《大乘起信论》	····· 马鸣著 真谛译	368
《圆觉经》	····· 佛陀多罗译	396
《楞严经》(节选)	····· 般刺密帝译	422
《地藏菩萨本愿经》	····· 实叉难陀译	522
《唯识三十论颂》	····· 世亲造 玄奘译	558

《心经》	玄奘译 564
《普贤行愿品》	般若译 567
《六祖坛经》	惠能著 580

导 论

李 森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传入中国后，又和儒道二教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三教之一。二千多年来，广泛传播，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哲学、文化艺术以至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位于今尼泊尔国境内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其时约当我国春秋战国之际，释迦牟尼和我国孔子大致为同一时代的人物。

悉达多王子创建佛教的时候，是当时印度各国频繁进行战争的时期，整个社会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之间也发生政治、经济冲突，社会动荡不安，在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作为王太子的悉达多预感到王朝难免覆灭的结局，痛感世间变化无常，痛感人人都生活在苦难中，终生为烦恼所困扰。作为王子，他的生活优裕舒适，又有很高的文化教养，读过很多吠陀经典，但所有这些优越条件，也不能帮助他去掉烦恼，获得精神解脱，于是他在 29 岁时，不顾父王劝阻，毅然别离妻子，舍弃王位，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出家修行。出家后，王子努力求得解除烦恼的方法，他

先到跋伽仙人的苦行林修行,以种种苦行折磨肉体,以求得精神解脱。但是,并未能取得效果,他不满意这种做法,只滞留一宿就离去。以后南渡恒河,到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跟随数论派信奉者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子修习禅定,但仍认为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于是,他又来到伽闍山苦行林,继续进行苦行修炼,传说他“日食一麻一麦”,磨砺身体,在尼连禅河边苦修,历经六年,但结果还是徒劳无功,终于悟出苦行无益,因为执着于苦行,以苦肉求得解脱,仍是执着于肉体。解脱的大事,不是用肉体受苦才能得到的,而是要忘了肉体才能得到;执着于苦行,还是不能忘怀肉体,心就无法清静,心不清静,则一切污秽不能消除,哪能走向解脱大道?王子悟到苦行无益后,就在尼连禅河洗去六年积垢,随后又接受了牧女献乳粥的供养,调养身体,恢复气力。王子恢复了气力以后,并未放弃寻求解脱之道,他又独自一人离开森林,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山一座小山,见到一棵繁茂的菩提树,他就在树下双腿趺坐,端正身念,静坐思索,决心寻求真正解脱之道,发誓:“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觉悟),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经过七天七夜(一说七七四十九天),王子感到心中平静,一切烦恼不再从心头生起,终于悟到“烦恼即菩提”,证成佛道,此时王子已 35 岁,从此人称王子为“佛陀”,或“佛”,意为真理的觉悟者。因为王子是释迦族人,成道以后人们尊奉他为世尊、释尊。佛陀觉悟成道以后,为了让人理解他的思想学说,开始了长达 45 年的传教活动。

印度佛教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原始佛教:约为公元前 6—前 5 世纪。佛陀说教最初是口传,为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

二、部派佛教：在佛陀逝世的 100 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裂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为根本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现实存在分为色法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犍子部，犍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重视三藏中的论藏，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 3 世纪末，主张“过去未来无体，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说外界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虚假或唯名的实在，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实有。大众部崇信神化的佛陀，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三、大乘佛教：公元一世纪，在印度南部从大众部系统中产生大乘佛教。“大乘”意为“大的运载物”，比喻可运载广大众生达到涅槃彼岸。大乘佛教把以往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

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初期阶段(公元一世纪——四世纪)。基本经典有《般若

经》(小品和大品)、《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维摩经》、《般舟三昧经》等,而以《般若经》影响最大。《般若经》主张万法都是空的,所谓“诸法性空”,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法华经》会通大乘和小乘,主张人人可以成佛。《无量寿经》宣扬西方阿弥陀佛净土。《华严经》讲大乘修行者应遵循的宗旨和可达到的阶位,强调“心”的本体意义和在解脱中的作用。

初期阶段的大乘论师有龙树及其弟子提婆等。以论释《般若经》思想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创立了中观学派。重要著作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认为世界万有为因缘所造,在本质上是空的。事物“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

(二)中期阶段(约四世纪末至六世纪)。基本经典有《涅槃经》、《胜鬘经》、《解深密经》、《楞伽经》等,以《涅槃经》影响最大。《涅槃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为大乘佛教解脱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佛性”意为成佛的内在可能性,有时与“法身”、“法性”同义,即与佛、佛法有共通的本性。有的经,如《胜鬘经》、《楞伽经》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楞伽经》还宣传三界唯自心所现。《解深密经》提出一切外界唯识所变和八识学说。

这一期的主要论师有无著、世亲兄弟。他们奉弥勒为先师,创立了唯识学派(也称瑜伽行派),主要著作有《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辨中边论》、《摄大乘论》及《摄大乘论释》、《唯识三十颂》、《十地经论》等。论证阿赖耶识缘起,一切唯识所变。此后有陈那、护法等人对唯识学说有较大发展,唐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中观学派的著名论师有佛护和清辨。

(三)后期阶段(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初)。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等,是这个时期特别盛行的密教经典。密教吸收中观和唯识学派的观点,又吸收印度民间的宗教信仰,以重视繁杂的咒术仪

礼和神秘主义的教义为特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言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戏剧祖太武帝和北周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来说,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行等曾有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这一时期,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译出了《法华经》、《维摩经》等大批大乘经典,流传极广。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促成了中国各大乘各宗派的建立。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八宗。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仍保持一定盛况。

元代的统治者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

明万历以后,株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深受士大夫欢迎和一般平民信仰,使佛教更具中国特色。

清初皇家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松,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衰微的佛教一时呈现活跃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

从以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发展的概述中可以看到,是印度大乘佛教最盛行时期,佛教传入到了中国,因而,中国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最先流入的主要是大乘经典,中国佛教宗派也主要是大乘各种宗派。大乘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主流,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特色。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主体,根本原因还在于印度大乘佛教的教理教义契合中国文化传统。这从对大乘经典的选择中可以充分地看出。在印度,主要的大乘经典是《大品般若经》、

《中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著作，但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并未得到流传，并无多大影响。相反，在印度影响并不大的一些经典，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阿弥陀经》，却在中国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以这些经典为基础还分别创立了中国各佛教宗派，如净土、禅宗等。从佛、菩萨的信仰看也是如此。在中国，除了信仰释迦佛外，中国信众最尊崇的佛和菩萨主要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其实，在印度佛教里，观世音是一个次要菩萨。但在中国人心中，她是救苦救难的最慈悲的理想人物。由一个男菩萨转化为大慈大悲的女菩萨，这就是因为符合中国人民入世舍身、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民族文化心理。

佛禅文化名著的选编即是以上述认识为基础，主要入选的即都是最深入人心、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大乘经典，也是对中国各佛教宗派影响最大的大乘经典。其中，由禅宗六祖慧能讲述的《坛经》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佛教大师撰著的佛经，也是当之无愧的佛教大乘经典。

本书的编撰参阅和吸取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特作说明，并衷心表示谢意。

《四十二章经》

〔后汉〕迦叶摩腾 译
竺法兰

作者译者介绍

本经传译的记载，与汉明帝求法传说有关。汉明帝求法有种种不同说法，本经传译的记载也多异说。最早的记载是《四十二章经注》（《丽藏》本经首及《出三藏记集》卷六所载与《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经序说，后汉孝明帝梦见金人，因遣张骞、秦景、王遵等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不载年月。西晋王浮撰《老子化胡经》说是永平七年（64）遣使，永平十八年（75）还（《广弘明集》卷九《笑道论》第十四）。《历代三宝记》以后的记载则都说是十年还汉。据上记载，本经的初传当在公元64~75年之间。

经序和《牟子理惑论》仅言从大月支国写取此经，未说翻译。《出三藏记集》卷二始说张骞、秦景等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肯定此经译于月支。《高僧传》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可见此经翻译地点。自梁以来尚无定说。至于译者，《出三藏记集》说竺摩腾译写，《历代三宝记》所引宝唱录，又以为竺法兰译。《高僧传》则先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后又说竺法兰译经五部，唯《四十二章经》现在。因并存